

# 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初探

黃東治

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副教授

## 壹、前言

運動與國家認同的議題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受到不少西方學者的廣泛注意和討論(Bairner, 2001; Caldwell, 1982; Hargreaves, 1992; 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and Bradley, 2002; Smith and Porter, 2004)。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且呈現許多面向和爭議。特別是在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以及在不同的時空中，運動文化皆以不同的形式來呈現，並透過運動的儀式、賽會和參與，讓人產生對自己群體的認同和歸屬感。而且在許多的國家，大多數人民對運動的興趣可能遠遠大過於對政治活動的關心(Caldwell, 1982: 173)。雖然如此，運動仍是激發民眾產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國家認同最重要的媒介之一，主要是因為運動很容易讓人產生榮辱與共的民族情感，例如當台灣獲得 2004 奧林匹克運動會跆拳道金牌的那一時刻以及王建民在美國大聯盟的比賽，經常成為台灣民眾關心的焦點。這些現象和民族的象徵使人們的民族優越感和認同感油然而生，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可能因此而編織出想像的共同體進而產生或強化國家的認同。然而，為什麼運動和國家認同有如此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對許多民族和國家而言，運動與建構和複製國家認同有直接的關係。而這些建構和複製的過程是如何形成的？在國際上運動和國家認同的發展為何？以及運動和台灣的國家認同有何關係？本論文透過近代運動的文化、歷史、政治、社會和民族主義學者所研究出的理論和文獻以及歷史事件的綜合分析，進而嘗試回答以上的問題。因此，本論文所要探討的主要議題有：

- 一、運動和國家認同的關係；
- 二、運動和國家認同的國際現況；
- 三、運動和國家認同在台灣。

## 貳、運動與國家認同

自 1980 年代以來，運動文化研究逐漸受到重視，並且在種族地位、性別、種族、年齡、社會階層等等議題上，已經出現詳細的討論。這些議題也已被認為是與國家有關的問題。然而當大家廣泛的接受運動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性時，哪一種國家認同的類型涉入政治以及政治與運動之間是以何種方式交互作用和影響，卻很難有精確的答案(Bairner, 2001: 163)。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幾乎都得面對如何處理國家認同感的問題。特別是在這個多變的世界裡，國家主要壓力來源是國家和人民都期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對於國旗、國歌、貨幣、食物、政策、世界高峰會議的代表的接納以及國家運動組織的持續尋求加入國際運動組織的機會等等，都證實了一種論點，那就是國家可以運用不同的方法來鞏固人民對領土的認同感。這些認同也促進國民的歸屬感，以及在全球化、價值或公民權利等相關議題上的國家主權性。在許多的實例上，顯示這些方法可能是一種神話，無論這些是否為真實的，至少部份人已經承認對自己民族文化和國家認同上的忠誠(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and Bradley, 2002: 148)。在討論運動與國家認同前，有需要先從國家認同的定義著手。

首先，在討論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時，需要先瞭解 nation (民族、國家) 這個英文字體的起源和意涵，其最接近的字源法文為 *nation*，拉丁文為 *nationem* 含有人種或種族的意思。這個字在 13 世紀末期，已在歐洲普遍使用，最初指的是「族群」而非「政治組織群體」，然而這些意涵經常有重疊和混淆之處，造成諸多爭論與複雜性。Nation 的政治性用法出現於 16 世紀，並在 17 世紀末期開始普遍。事實上，自 17 世紀初期 nation 出現了一種用法，意指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通常是與一個國家之內的某個群體形成對比。因此，National 這個形容詞從 17 世紀起，即侷限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和政治的單一意涵裡 (Williams, 1983: 213-214)。特別是在英文中說「國家的」時候，由於 state 無法轉為形容詞，常會使用 national 這個字取代國家的意思。

然而，在英文中 *nation*（民族）和 *state*（國家）仍有不同，所以才會產生 *nation-state* 和 *state-nation* 這兩種名詞。「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語言、宗教、種族、歷史、傳統、風俗習慣或共同特徵的共識而結合的一個社群或共同體。「國家」是指擁有一定土地、人民、政治結構、法律制度和政治權力的政治實體。因此，民族是心理、文化和社會的概念，而國家則是政治和法律的概念(Reijai and Enloe, 1972: 140)。在台灣的學者一般認為 *national identity* 可譯為「民族認同」但也有學者譯為「國家認同」或「國族認同」，無論其譯詞為何，英文的名詞應無疑義，但施正鋒仍強調：國家認同是對於國家機器或政治體制的認同，或是效忠共同的一套價值觀、象徵、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施正鋒，2000: 8）。

從這些定義來看，運動文化的國家認同涵蓋的層面相當廣泛，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也是在單一運動文化特質或相關整套運動文化特質基礎上建構意義的過程，而在諸多意義的來源中，這些運動文化是佔有優先位置的(Castells, 2002: 6)。在進一步深入討論這些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的關係前，有必要先概略瞭解運動文化的起源。一般的體育運動史在探討運動的起源時經常提起古希臘的「競技」和「運動」活動以及後來自 1896 年起復興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然而社會學家 Norbert Elias 並不認為古希臘的「競技」和「運動」活動和現代的運動是類似的。他認為今天全世界以大同小異的方式從事的各種運動幾乎都是源自於英國，而且這些運動是大約從 19 世紀下半葉到 20 世紀上半葉流傳到其他國家(Elias, 1998: 161)。為何在這段時間英國的運動，流傳到世界各地成為世界性的運動？這種現象如何解釋呢？這類的運動娛樂顯然符合人們具體的休閒需求，而此時期的許多國家也感受到這種需求(p. 163)。Elias 的這段話間接的說明了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的產生關係的形成過程。他也認為廣義上，如同工業發展一般，運動是指國家形成之前宗族社會和前工業時期國家社會的一種獨特活動，也是指工業時期民族國家的一些相應活動。在狹義且精確上，在 19 到 20 世紀的「工業化進程」具有的某些特質明顯有別於過去其他的生產方式。簡而言之，「運動」(sport) 在廣義上是指一切社會的競賽和體格鍛鍊；狹義上是指起源於英國然後流傳到其他

國家的某種具體的競賽活動，這種進程 Elias 稱之為競賽的「運動化」(sportization)，他強調「運動」潮流的那些休閒活動其結構與組織的發展和工業化的發展一樣獨特。

從 Elias 的論點來看，現代運動的發展進程與國家認同的進程，似乎是在同一時期所發生的特殊歷史現象。換言之，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具有共同的歷史基本特徵就是「現代性」(Hobsbawm, 1990: 17-28)。Hobsbawm 在其影響國家認同深遠的著作《傳統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中說明現代形式中的許多盛典，事實上是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產物。那些表面上看來或者聲稱是古老的「傳統」，其起源時間往往是相當晚近發生的事，而且是被發明出來的。「被發明的傳統」通常意味著一整套由已被公開或私底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一種儀式或象徵的特性，試圖通過重複來灌輸某些價值和行為規範，而且必然暗含與過去的連續性(Hobsbawm, 1983: 1)。Hobsbawm(1983: 283)在研究 1870-1914 年歐洲大規模生產的傳統中，更進一步解釋這一時期的發明最具普遍性的傳統幾乎都是由國家所完成的，而他們也注意到典禮、儀式和神話（通常包括一種虛構的過去）的重要性。

Hobsbawm 特別強調運動(sport)在此發明過程中的重要性，並以足球為例說明最早自 19 世紀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後期，足球產生了我們現今所熟知的所有制度和儀式上的特點如：職業化、聯賽、足總杯比賽、定期到場觀看週六的比賽、球隊支持者以及他們在文化上和儀式上的抗爭，這些通常都發生在工業城市或大都市的不同區域之間。事實上，剛開始足球是英國貴族學校的中產階級，用來作為一項業餘和陶冶學生性格的學校體育項目，後來在 1885 年迅速無產階級化，進而職業化。而且再透過移居國外的英國人，將足球傳播到世界其他國家(Hobsbawm, 1983: 288-89)。從這些運動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出群眾和中產階級的運動，都以另一種方式涵蓋了政治與社會傳統的發明，並成為國家認同和人為形成的共同體的工具。實際上，群眾的體育運動長久以來就和民族主義運動或是國家認同有密切關係。例如，在英國運動流傳的初期，德國體操運動基於民族主義的

立場，曾抵制英國的運動發展，因而造成當時群眾體育運動在德國發展的遲緩。另外透過選擇或發明獨特的民族體育運動項目，成為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提供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例如，愛爾蘭人的蓋爾足球(Gaelic football)或加拿大的冰上曲棍球。

Hobsbawm(1983: 298-99)歸納出當時運動的發展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19 世紀最後三十年顯示出舊運動項目的傳播、新項目的發明以及在國內和國際範圍上制度化的重大轉變。其次，這些制度化的改變為運動提供了公開展示的場所，以及將原本屬於貴族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中的運動，擴展至當時日益擴大的中產階級，乃至於後來普及至勞工階級。最後，運動將社會階層相同，但卻無社會或經濟關係的人提供一種結合的機會，如資產階級的婦女。在二十世紀新興國家形成的過程中，運動經常成為消除種族差異的有效工具和催化劑。一般而言，在討論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之間關係時，可能會提到以下的論點：

1. 運動天生就是保守的，而且有助於統一官方或是中心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2. 運動具有某些與生俱來的特色，使它可能成為國家統一和團結的工具。
3. 運動提供了一種安全閥或是弱小民族與國家情緒能量宣泄的途徑。
4. 運動有助於獨特的政治鬥爭，運動和一些民族主義的政治以及群眾的民族主義鬥爭，密切的連結在一起。
5. 運動通常需要民族主義的加工，如對於依賴和不平等關係的自然反應。
6. 運動有助於認同的追求，無論是在地區或全國的規模上都可透過懷舊之情、神話、傳統的創造、旗幟、國歌和慶典儀式等追求認同(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and Bradley, 2002: 153)。

從以上的觀點，可以看出運動文化有助於鼓舞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雖然這些民族主義政治活動擁有非常不同的各種型態，但是它們仍共同具有某種假設，如民族國家的存在，並且或多或少輪流交替訴說著過去的歷史、建構民族的神話以及創造傳統。更進一步說，雖然國家認同有部分來自於人類的想像，用

Benedict Anderson's (1991)慣用語來說，就是「想像的共同體」。這也顯示出國家認同如同意識型態般的現實基礎。Canova(1996: 56)認為「所謂民族(國家)的陳腔濫調是根據意識形態而來，因此需要經由觀察來給予其適當的資格。這類想像的社會不是單單經由個人的選擇便可以建立，就像足球隊的球迷們一般，經由這樣的方式便可成為想像的社會。」儘管可能有人會質疑 Canova 的定義範疇，例如某些足球支持者，認為他們是出自內心由衷地崇拜他們所選擇的足球隊伍，無論是國家代表隊或某一個職業球隊。但製造神話傳說以及創造傳統對於建構國家認同是相當重要的環節。事實上，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的關連，明顯具有神話特色般的作用(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1-14)，僅從這一觀點就相當值得我們去深入討論。然而，由於國家認同的概念經常是人為建構的（盧建榮，2006）。因此，往往在不同國家或民族內的國家認同，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可以確定的是運動和國家認同之所以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可從它們興起的過程中，發現它們共同具有的現代性和相似的發展進程。為了進一步瞭解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有必要先從受英國運動文化影響深遠的幾個國家或民族開始討論。

### 參、運動的國家認同在其他國家

在國家認同的討論裡，似乎運動文化並未受到民族主義研究學者的太多關注，特別是 Anthony D. Smith 並未將運動文化視為重要的實例來探討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概念。而大部分運動文化研究學者傾向於大量引用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和 Eric Hobsbawm 的「傳統的發明」等概念來分析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的關係(Allison, 2000: 354)。Anderson 和 Hobsbawm 共同的論述觀點是認為國家的概念通常是透過重新創造的逐漸演進過程產生，並非一蹴可即。Hobsbawm 也舉出相當多英國現代運動的創造過程，來說明現代國家認同概念的產生。從 Hobsbawm 的實例給我們更多的啟發，去思索受到英國現代運動文化影響的國家，他們的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的關係為何？以下將概略探討愛爾蘭、蘇

格蘭、加拿大和美國的情況。

## 一、愛爾蘭

在談論北愛爾蘭 Ulster 的英國聯邦主義者和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經常產生問題，然而在探討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似乎和其他的民族主義一般，事實上它已經存在。但是許多將運動文化和愛爾蘭民族主義兩者連接在一起的想法都有一點單純。在開始分析運動文化和愛爾蘭的國家認同議題時，首先要追溯愛爾蘭運動的歷史。愛爾蘭現代的運動文化的建立幾乎都和英國有關。英國在此領域扮演了開創性的角色，所以「運動競技活動」處處都有大英帝國的影子。根據 J. A. Mangan(1987: 139-140)的說法「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精英教育，不管是在國內或海外，品格的形成是基本的目標」。品格的製造，需仰賴有品格的訓練人員，而這些人員大部份是來自公立中小學和古老大學的老師，他們利用遊戲場所當作道德教化的媒介。

一代又一代的帝國統治者將英國的運動帶到大英帝國散佈的每一個角落，首先，運動可以自我娛樂。其次，運動有助於和當地的精英份子有著更密切的關係，最後不僅僅把運動介紹給當地的居民，也灌輸他們英國優越的生活方式，以獲得他們的尊重。結果如同 B. Stoddart(1988: 666)所觀察的，在帝國的顛峰…… 運動像是一個文化的結合力，有著相當大的力量，經由結合帝國主義的勢力和一些有影響力(即使不是最有影響力)的殖民地居民來傳遞許多道德的形式和行為法規。

然而，並非每個地方都能透過英國運動比賽的方法去影響殖民地。在運動文化方面，比起許多其他地方，愛爾蘭在大英帝國計畫中，呈現了一種較複雜的寫照。在運動文化方面的文獻中提到英國和愛爾蘭之間關係產生的問題，是基於三個主要的理由：首先，因為二者地理位置的鄰近和家族關係的密切，以及個人關係在個別上流社會間的聯結，因此愛爾蘭比較困難在帝國和當地的精英份子之間作一個清楚的區別。舉例來說，他們兩者的成員都是在相同的學校和大學受傳統的教育，嚴格地來說，有很多都是上同一所學校或是大學。結果，在英國式的運動比賽上，他們分享了共同的基礎訓練。

其次，在愛爾蘭島的東北方角落，仍有大量的新教徒和聯邦主義者的社區，他們不僅與英國的種族有重要的關聯，而且長久以來忠心於英國的傳統思想，其中也包含了運動和休閒文化領域。北愛爾蘭的英國聯邦主義者接受英國運動比賽一向被視為文化延續的一部分，而不是帝國主義者外來文化的施加結果。然而，後來運動和愛爾蘭民族主義之間所建構的關聯是具有特別意義的。因為在愛爾蘭，不像帝國的其他地方，早已存在著有組織或是半組織性的運動系統，例如愛爾蘭傳統的足球和球戲 (football and hurling)，這些都是遠在英國現代運動之前就已經存在，而這也提供了一個表達反抗英國統治的媒介。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從事屬於他們自己的體育活動，來幫助他們維持他們與英國不同的國家認同。

在十九世紀愛爾蘭民族主義者運動成長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創立了蓋爾運動協會(GAA, 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一個將目標放在保護和發揚傳統的愛爾蘭運動和娛樂的協會。GAA 是以產生和重現國家認同意識為明確目標的運動組織中，常被拿出來當作最好的例子。B. Houlihan(1994: 191)舉例提到，GAA 在文化反抗方面的成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此外 W. F. Mandle(1987: 69)，也懷疑 GAA 對愛爾蘭民族主義政治發展的貢獻。事實上，他們的研究指出愛爾蘭的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而明確。

GAA 所成立的目的是培養愛爾蘭的休閒娛樂。首先，它比較重視的是體育運動，然而當時比蓋爾運動更受歡迎的體育活動是受英國所控制的。因此，GAA 成爲了帝國文化掌握霸權計畫中一部份。慢慢地，愛爾蘭式球戲及足球比賽開始增加。另一方面，GAA 的政治特性已開始更爲複雜，而且爲因應愛爾蘭歷史的衰退與變動，也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首次的集會，新教徒也參加了，保持了當時 Gaelic 蓋爾語（愛爾蘭語）的精神，同時也有新教徒支持者積極參與 Gaelic 蓋爾語的復興行動。此外，GAA 也控制它最初的成員代表，主要都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愛爾蘭民族主義最主要因素是：教堂，實際的武力及立憲主義，這些在 GAA 建立與其活動的早期，都一起帶進來了。然而，協會的第一任主席(Maurice Davin)是位極佳的運動員而非政治的倡導者。即使他們最初所關心



的是體育活動，但隨著 GAA 的成長，就像星星之火般燃起一場愛爾蘭民族主義精神戰爭的開始。

運動文化與愛爾蘭的國家認同的建構有密切關係。但是這種建構對聯邦主義者的認同是否有貢獻？另外在全球化過程的威脅下愛爾蘭的認同是否可能成功抵抗全球化力量？如果選擇 GAA 作為後者的主要元素，那麼有一些地方需要特別注意。蓋爾運動，特別是蓋爾足球，雖然仍然普遍，但相較下愛爾蘭的球戲已有些微沒落。然而至少在象徵性層面上，GAA 在愛爾蘭的國家認同上仍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更加重要的是 GAA 從未有過愛爾蘭全國性的觀點。近來在一些人認為 GAA 已是過時的產物，在全球化的影響下，GAA 有需要國際化並開拓其全球的市場。

## 二、蘇格蘭

很少人會懷疑蘇格蘭可以稱為一個民族，或許某種蘇格蘭民族認同感早已存在好幾世紀了。蘇格蘭王國概念之形成可遠溯至十二世紀(Lynch: 1992: 37)。直到十四世紀，蘇格蘭的社會才由一股忠誠感凝聚為一體，這種忠誠感既是針對蘇格蘭國王，也是來自於英國壓迫性的民族認同感。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民族認同感，在一連串與英國的戰役中不斷地被強化。雖然蘇格蘭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民族，然而蘇格蘭早期並不具有現代單一民族國家的外貌，可稱為沒有國家之民族，因為蘇格蘭國會已於 1707 年放棄蘇格蘭的所有權，以個別的政治實體形式存在，當時聯合法案將他們的國家與英格蘭結合起來，成為大不列顛帝國的一部份。誠如 L. Paterson 指出，自從交出政治的國家主權後，幾乎在三個世紀當中，蘇格蘭仍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他強調「事實上，若不考慮憲政或政治狀態，自大不列顛帝國聯盟成形以來的三世紀中，大部分時間蘇格蘭一直處於獨立自主的狀態－雖然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但也絕非僅僅是個省分而已」(1994: 4)。從英國的觀點來看，實際上蘇格蘭來自英國的自由，部分是來自英國允許許多有關宗教、法律、教育或政治的機構繼續存在，這對於身為不同民族的蘇格蘭而言，這些機構不僅特殊且具特色。多年來，英國如此謹慎地處理蘇格蘭民族認

同感，寓意深遠，同時也引發相當多爭議。

蘇格蘭人如同北愛的反抗份子一般，與英國人享有共同的運動文化，然而特殊的蘇格蘭高地傳統仍有別於其他區域。G. Jarvie (1991) 舉例說明板球運動在北愛比在蘇格蘭更加受歡迎。種種關於蘇格蘭運動及其對民族認同關聯的分析，可以兩項觀察為開始。首先，需注意到有獨特的蘇格蘭式運動文化存在。另外，即使身為蘇格蘭人，也並不表示他們可以共同分享或擁有一般運動文化的經驗。

體育運動作家 R. Forsyth 認為運動競賽在蘇格蘭不僅一向是最受歡迎的蘇格蘭式表現，事實上也一直為其明顯的獨立主張的發聲筒(1992: 334-353)。運動在蘇格蘭大受歡迎，特別是對蘇格蘭的男性而言。然而 Jarvie and Walker 指出，即使蘇格蘭特色的運動文化已匯聚成一股國家、階級，甚至共同體的認同感。然而重點是，蘇格蘭是誰的國家？誰的共同體？在什麼時期？然而在大量描寫蘇格蘭風格的運動賽事（特別是指具代表性地位的足球）的相關著作中，這些考量往往被大部分人所忽略(Jarvie and Walker, 1994: 3)。英國運動歷史學家 R. Holt 認為蘇格蘭人在文化上太過於重視足球了。當然國家足球隊的表現好壞無疑地經常對蘇格蘭人民之自信心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假如蘇格蘭於 1978 年的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賽贏得冠軍，有可能改變 1979 年的獨立公投，甚至同年的大選結果(Holt, 1994: 58)。這種假設雖然不至於直接說明運動賽事與蘇格蘭國家認同的間直接關聯，但卻使人不禁聯想到，運動文化對於在蘇格蘭本土建立政治性國家認同的努力，有可能產生反作用。

即使蘇格蘭人支持其運動競賽選手，好像他們是依賴特殊比賽的勝利而活一般，但是這些卻也證明他們不願採取必要的政治措施謀求蘇格蘭政治上的獨立。表面上卻藉由運動賽事的場合中所顯現的狂熱，表達對蘇格蘭的熱愛。Jarvie and Walker(1994: 8)認為「目前的蘇格蘭社會中，運動的功能已成為政治民粹的替代品」。另外他們似乎宿命地，承認蘇格蘭人欠缺掌控自身命運之決心。運動文化如何影響蘇格蘭國家認同及政治態度的本質，多少顯示出運動可反應出蘇格蘭的國家認同分歧至何種程度。無論如何運動文化在蘇格蘭已成為國家認同的基本成

分，但卻是屬於特別脆弱的那一種。如果要釐清蘇格蘭本土的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間錯綜複雜之關聯，有需要從整個蘇格蘭的歷史輪廓更深入的探討蘇格蘭國家認同的議題。

### 三、加拿大

自1960年代以來，加拿大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國家認同受到相當多的討論。特別是加拿大人在文化上可分成許多不同的面向，但是吸引最多人注意的議題是分離主義運動的發展，這個運動聲稱代表魁北克省多數法國人的心聲。在最近的統計中顯示700萬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三說法語的人為種族上的多數卻為語言上的少數，而且其中佔大部分的76萬人是能說英語的，他們大多數支持魁北克省繼續為加拿大聯邦民族國家的一份子 (Lawton, 1995)。同時，統一的國家認同在加拿大已經漸漸地涵蓋其他族群的聲音，平等看待這些族群在加拿大社會中的地位，並認定他們是真正的加拿大人。另外，加拿大人已經被迫嚴肅面對逐漸增加中的美國文化影響力，如同他們的祖先一般，不得不尋求方法來挑戰英國人的文化霸權。如同在說法語者和說英語者之間的爭論一樣，這些問題已有悠久的歷史，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運動文化也扮演了其中一個重要角色。

歷史顯示運動在加拿大說英語者的國家運動主義的建設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國家體育運動的定義不可避免地與嘗試定義國家有密切關係。如果對國家的認知是受單一性和排外性所鼓舞，那麼體育運動和其他文化傳統就有可能成為有利於政治目的的工具。在許多方面，不僅是在世界性的運動方面，加拿大已經發現他們在抵擋美國化的壓力，如 A. Hall (1991: 13) 等人聲稱「加拿大有組織的運動是不同的，因為加拿大的社會是相當獨特的。」不管困難度為何，加拿大試圖維持一個不同的運動認同，例如加拿大的運動曾短暫地跨足美國市場。若是沒有加拿大運動員對曲棍球的國家熱情，加拿大曲棍球聯盟要擴展到美國是不太可能，加拿大的曲棍球已經影響美國的運動文化。實際上，他們的對抗也提供了全球化更進一步的證據。全球化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否是一樣明顯？直到最近，大家已慢慢接受全球化的概念，並認為全球化對國家認同具有一些明顯的威脅。然而，加

拿大的例子，在所謂全球化的過程中，也提供了很好的證據，就像 Maguire (1999) 所強調的，在這樣的環境下，按捺已久的國家認同團體，已經開始發出不同的聲音。

運動比賽已提供加拿大人抵抗來自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壓力的領域，也成為政治文化抗爭的戰場。因此，一方面運動已幫助加拿大的統一，使他們更確定自己到底是什麼人。在另一方面，也更確認運動是社會、文化、政治的縮影，這些現象經常困擾著加拿大，如美國運動文化的影響。加拿大的運動文化及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讓我們深思運動文化在社會分裂國家的發展中的重要性。

#### 四、美國

美國人不像其他大部分民族那麼關心國家認同的問題。美國有它自己的國家運動文化，而其中部分是和加拿大所共有。這種狀況本身可視為運動和國家認同之間有著連帶關係的證明，不過仍需要經過學術的評論。然而令人感到興趣的，是運動文化在建構某種國家認同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如何有效地將人民團結在某個共同目的之下。在這方面，美國也不例外，運動已經在建構和重建國家認同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論是否因為缺乏國際比賽。如同 R. C. Wilcox(1994: 75) 所觀察到的情形，「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它的國家認同感很脆弱，而且蓋上了一層不確定性」，但是「愛國主義透過美國的體育運動活動表現出一種強大的力量」。

在美國實際建立國家很久以前，運動和比賽就在現在的美國領域內風行。第一代移民就有包含現代長曲棍球運動雛型的比賽文化。然而，和美國國家後續發展關係更密切的就是殖民地居民的體育活動。這些活動大部分是從英格蘭繼承而來，包括狩獵、賽馬以及鬥雞。十七世紀的清教徒試圖勸阻某些體育運動的活動，但是除了新英格蘭地區之外以及南方的殖民地，更興起活潑且多樣的運動文化。在十九世紀，富裕的士紳階級成為運動文化的主要擁護者。D. J. Mrozek(1983: 149) 認為「運動所以能夠興盛起來是決定在能夠獲得中、上層階級的重視，他們的支持雖然不能決定運動的內容，但是他們的反對可能會阻礙運動的發展」。

對於大部份這些紳士，參與運動競賽根本上已經代表對他們「英國式生活」(Englishness)的肯定，相對地當時尚未建立起獨特的美國國家認同(Gorn and Goldstein, 1993: 149)。然而在獨立之後，加上十九世紀期間美國社會的巨大轉變，新的認同開始興起。這個時期從 1825 到 1870 年之間是一個通訊和交通運輸改進而且更加都市化的時期。這些因素各別都會讓國家運動文化的建構更能達成。內戰後美國社會的重建正和建立現代運動文化的時代一致，是先從英國開始然後擴及其他的方面。

在十九世紀末之前，依照 Gorn and Goldstein(1993: 99)的說法「運動是促成新的社會組合和意識形態的原因」。這些原因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主義。Rader(1988: 141)認為「十九世紀運動俱樂部的歷史正反映了獨特族群在文化上的同化過程」。接近二十世紀的時候，許多移民族群接受了美國固有的運動文化，而同時種族地域之分也平息下來了。運動牽涉到美國國家認同的建構和重建，特別是超越了人種、種族和語言的差距。

從 1860 到 1870 年代是運動的快速擴張的年代，此時標準化也在整個國家進行，而且商業的支持也在持續成長。從 1876 到 1926 年，美國穩定地建立了它本身的國家運動文化。因為媒體的幫忙，吸引大量的美國運動觀眾。運動已經成爲一種社會結合的力量(Pope, 1997)。在這期間，建立了國家大部份的主要運動組織，包括在 1876 年棒球的「國家聯盟」以及六年後的「美國聯盟」。在 1880 年代，高爾夫球和網球的流行都經歷過一個快速的成長期，而美式足球、徑賽和田賽也經過適當的規則化後成爲廣泛受歡迎的體育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種獨特的美國運動文化，極強調棒球、美式足球、籃球和曲棍球的團隊運動上。的確，它已經顯示出強調團體運動是獨特的美國特性。在這些美國比賽中，根據它對美國所代表的意義來說，最重要的可以說就是棒球。

運動在美國國家認同的建構上所扮演的角色。如同 Pope(1997: 76)所指出，「透過運動儀式和舉辦的盛會，也倡導了對國家的忠誠和愛國主義，並將運動和民族主義連接起來..... 重要的國家和國際的比賽，像超級盃決賽和奧運會都具體化

成政治儀式的全套盔甲，用來提醒人們他們的共同性。」依照 Pope 的說法，「奧林匹克提供了一個競技場，某些美國人藉著運動的非凡成就和國家的神話連接起來，而發明和推動他們的政治和運動文化的象徵」(p. 40)。特別是在冷戰時期，運動顯然扮演著傳遞美國價值的功能。此外，美國的運動文化似乎注定要和競爭、商業、男性氣概等因素相聯結(Wilcox, 1994: 75)，並協助維持一個美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受到無數美國民眾的青睞。例如像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樣的活動，已經在各種不同的時代，提供美國人去欣賞他們的運動員的優異表現，進而去欣賞他們自己的機會，這種模式在歷史上經常發生。然而，正是因為對於國家主流價值體系的支持，運動文化也悄悄地在產生和複製出美國人在不同階級和族群之間的鴻溝。然而，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否代表「美國化」和資本主義的勝利還有待更進一步的深入討論。

以上簡要介紹四個與英國歷史上曾有過密切關係的國家或民族，從他們的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關係的發展，可以觀察到運動本身的發展和國家認同概念的現代性，以及國家認同概念的多樣性。在世界霸權中心和被併吞民族的人民心目中對國家認同的想法，即使有某些共通處但仍然是大不相同的。而不同背景的人民，對何種運動可以促成國家認同的概念也大不相同。從這些不同國家案例，也明顯呈現出幾種特徵，首先，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幾乎和每個國家都有相關性。第二，雖然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在許多國家看起來有一點相似性，但並非表面上所看到得那麼單純。第三，檢視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形成的關連性，可以使我們更清楚理解到每個國家，都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和認同因素。同樣地，台灣的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也具有其獨特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值得討論。

#### **肆、運動和國家認同在台灣**

前面的論述已分別從學理上和國際實例上，說明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的關係以及它們發展的現代性。接著有必要進一步延伸，討論運動文化和台灣的國家認

同關係為何？獨特性為何？值得我們分別從台灣運動文化的起源和台灣國家認同的起源開始談起，然後再進入運動文化和台灣的國家認同關係的深入探討。

自古以來，台灣地處世界的邊陲，直到 1545 年葡萄牙人發現這個美麗的島嶼「福爾摩沙」(Ilha Formosa) 之前，似乎並沒有太多人關注這個地處西太平洋的小島。雖然在中國的古籍中有疑似台灣的記載，但以猜測居多，另一方面，知道台灣並不同於統轄台灣。明鄭以前台灣與澎湖各有自己的歷史脈絡，澎湖自宋代即有漢人居住，後來也成為元帝國的一部份，但是台灣成漢人大量移民的地區，主要是開始於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的獎勵和招募（周婉窈，1998：46-47）。荷蘭東印度公司從 1642 年開始統轄台灣，直到 1662 年被鄭成功驅逐為止，前後共在台灣 39 年，荷蘭人的統治從此開啓了中外勢力交叉影響下的台灣四百年近代史。

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以台灣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是漢人在台設立政府的開始。鄭不但帶來可觀的軍隊和人口。1683 年明鄭與清政府交戰失敗投降，自此台灣正式納入清朝的版圖。1895 年中日甲午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 年台灣又再度納入中國版圖。1949 年代表著西方不同利益的美蘇集團，各自支持的國共勢力在慘烈內戰後，國民黨戰敗退據台灣。直到 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又再度將台灣納入西方的勢力範疇至今（湯錦台，2002：10；167-168）。在此特殊的歷史背景開始下，台灣的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也有其獨特的形成過程。

近年來有關台灣體育運動歷史研究的文獻，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蔡禎雄，1995；許佩賢，2005；謝仕淵、謝佳芬，2003；謝仕淵，2004）。大部分的學者論述，幾乎都是著重於台灣的日本時代的學校體育教育或日本人引進的現代運動。然而值得爭議和深思的是到底在 1895 年以前，台灣是否已經存在運動文化或更早的身體活動文化？誰是台灣現代運動的引進者？為什麼台灣早期的體育運動史直到近十年才開始出現？

台灣的史前時代，可以追溯回人類的出現時候的冰期，大約是距今二百萬年

至一萬年前，當時的台灣、日本以及鄰近島嶼都與東亞大陸連成一塊，直到約一萬八千年至一萬年前的第四冰河期結束，氣溫逐漸上升，海平面才逐漸上升，地理景觀發生激烈變化，島嶼才慢慢與大陸板塊脫離（周婉窈，1998: 11-12）。1968年，台灣大學考古隊在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挖掘出目前為止台灣最古老的史前文化遺址「長濱文化」，距今約一萬五千年到五萬年，長濱人是屬於「石器時代」的人類，主要是使用石頭做成的工具，也使用骨頭製成箭頭用以打獵。

Jared Diamond 影響深遠的《槍砲、病菌與鋼鐵》(1998: 373-76)說明考古資料發現，距今約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台灣已出現磨製石器和陶器外，也發現稻米與小米，表示已有農業的發展。此外，航海、捕魚的技術也相當進步。他更強調四個南島語系的亞群中，有三個是集中在台灣，表示台灣是南島語群的故鄉，而且已經說了幾千年，所有其它的南島語，遠從東非的馬達加斯加島到大洋洲的復活島，都是由台灣出發的祖先帶出去的。雖然史前時代台灣的身體活動，在缺乏文字記載和直接的證據說明下，依目前的考古資料推測可能仍以農耕、打獵或一些宗教活動為主，但航海的技藝應相當進步，只是記載的文獻並不多。而後來的「鐵器時代」距今約兩千年前，考古學家在台灣北、中、南地區均有發現此時期的文化遺址，當時的人們已使用金屬工具，農耕的部落生活，具有共同生產、打獵等生活方式，也有簡單的宗教儀式和講究的葬禮(楊蓮福，2001: 12-15)。

直到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初，台灣和外界開始有貿易關係後，才開始有一些很有限的文獻記載早期的台灣情況。曾經在台南長老教會服務的蘇格蘭牧師甘為霖(W. M. Campbell) 在他 1903 年根據荷蘭史料譯成英文的《荷據下的福爾摩沙》為研究早期台灣歷史提供寶貴史料。書中特別提到台灣先住民生活，年輕男人主要的工作是狩獵和打戰。他們狩獵的技巧有佈陷阱、標槍和弓箭。他們幾乎可以跑得和鹿一樣快。他們戰爭的武器是盾、槍和箭。盾很寬且長，也常使用日本盔甲及弓箭等。戰爭的形式主要有誘敵、調虎離山然後肉搏戰，以及設陷阱等(Campbell, 2003: 21-23)。由此描述可以概略看出直到十七世紀初，台灣的先住民



仍處於部落的生活狀態，並沒有所謂「忠君愛國」、「馬革裹屍」這類為國獻身的國家概念，而他們爲了生存，身體活動的技能相當熟練。鄭成功來到台灣後的明鄭政權是屬於小朝廷的規模，積極發展農業，也實施「屯田制」把土地分給將士，讓他們平時能種田養活自己。農閒時訓練士兵弓箭、武藝和陣法。

清朝統治台灣的二百多年，初期並未重視建設和教育。直到十九世紀末台灣開港通商後，爲防止外國侵略，才開始解除渡海禁令，派沈葆楨、劉銘傳來台經營並設立行省。日本統治前很少聽到台灣人有接觸現代運動，但 1964 年移居台灣淡水的英國茶商 John Dodd，在《北台封鎖記》書中記錄 1885 年五月二十四日，對相處九個月的英國砲船官兵依依不捨之景，分別提到他們曾從事的各類運動如草地網球、賽跑、板球、拔河、跳高、跳遠以及撞球等（陳柔縉，2005：218）。此外，1882 年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在淡水創辦牛津學堂（今台灣神學院前身）後又設立淡水女學堂（今淡水中學的前身），1885 年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南創立的「長老教會中學」（今長榮中學的前身），這些學校後來均有相當優秀的運動傳統，是否在日治以前就已在學校積極推展現代的運動與體育，值得運動歷史學者深入研究。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2002：570-71)強調在十九世紀末，台灣所以成爲一個理想的殖民地，在於它的居民還沒有明確的民族歸屬感，特別是台灣長久處於中國政治文化的邊陲地區，而維新運動所傳達的早期民族主義意識也是遲至 1898 年才姍姍來遲。日本自 1895 年統治台灣開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體育課即扮演這種凝聚國家認同的重要角色。日本透過現代化的教育制度，開始引進學校體育和西式、日本式的體育運動到台灣，這是統治階級首次以制度化，組織化的方法將運動推展到台灣的社會。

日本據台前的台灣並無西方學校的教育制度，更無「體育」的教育科目，它是在日本佔領台灣後，在統治者當局的計劃下，傳入台灣並開始實施。……學校在其年間行事中，將運動會列入重要工作之一來實施並藉此招待學童的父兄來校觀覽，除了消除他們對體育的疑慮外，也加深對

體育的認識..... 在體育科的教學內容上，除了體操、教練和遊戲之外，在日本治台的中期，也陸續的傳入各種球類運動及近代 Sports，這不僅使得台灣青少年，在學校教育中能吸收新知識和新技能，同時在課外時間裡所實施的各種運動競賽，小至校內班級，大至台灣全島各地及至於全島性的規模，使得台灣人有同台競技的機會，也造就不少運動人才.....（蔡禎雄，1995：155-56）

從以上論述的這段體育歷史，可以看出日本殖民政府是如何不遺餘力地將運動推展到全台灣的各級學校和社會各階層。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項德政，但是事實上，仍鞏固日本殖民統治的目的。正如 B. Stoddart(1982)所強調：運動常常成爲統治階級傳遞其統治觀念與價值的最主要手段和工具並利用運動來說服被統治者接受、服從統治機構。在此時期，將運動會列爲每年學校的重要工作即可看出運動的主要功能，在運動會中升日本旗、唱日本國歌和軍歌、殖民者向被殖民者訓話、演奏軍樂、統一的運動服、統一的顏色、整齊一致的大會操、開閉幕儀式..... 等顯示經由運動會的儀式，傳遞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以及對國家各種象徵物的尊敬、服從和忠誠，而且這些有紀律和有團隊精神的行爲都是受到統治階層所青睞。另外，日本殖民政府也將日本的傳統運動柔道、劍道、相撲、射箭等傳入學校的體育活動，均有助於其達成「皇民化」和文化認同的教育目的，那就是培養日本式的思考、經驗以及培養日本的民族精神。

雖然從國家認同的角度觀察，運動具有積極的官方認同意義。然而，也有社會整合的作用，成爲人民日常生活與文化的一部份，同時也有舒緩殖民緊張關係的作用。台灣人民很快的接納和喜歡各種的體育活動，男女學生熱情的參與田徑和游泳賽，男學生更參加網球、籃球、排球、橄欖球、足球、曲棍球和棒球。1912 年開始組織地區運動會，在鄉村出現廣播體操會。棒球更受到全島的歡迎，出現少年、青少年和成人的棒球聯盟，1917 年在台北熱情的觀賞早稻田大學棒球邀請賽（鶴見，1999：145）。1931 年的「嘉義農林棒球隊」是混合台灣和日本學生的球隊，曾代表台灣參加甲子園的全日本高校棒球聯賽榮獲亞軍（謝仕淵、謝佳芬，2003：43-46）。此外，在 1935 年台灣歷史上的最大的博覽會期間，

台灣體育協會舉辦朝鮮、滿洲、台灣三地的棒球比賽和陸上競技運動會展現日本海外殖民的成就（程佳惠，2004：181）。棒球文化的發展，對台灣而言意義深遠，即使戰後殖民者走了，棒球仍然留下，甚至成為強烈國家認同的一項運動。

然而，體育教育的日本化，並非在使台灣人變成日本人，而是在訓練台灣人成為服從、勤勉的日本臣民。而這也並非在使台灣社會徹底日本化，而只是要以體育教育作為同化政策的手段而已。反過來說，台灣的知識份子也並非完全無條件的接受日本的同化教育，透過留學生接觸到新思潮，慢慢開始產生民族意識覺醒，當時的知識份子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推動文化運動，各地紛紛響應，例如他們在台北州組織台北青年體育會以促進文化交流、獎勵體育活動為宗旨，鍛鍊健全體魄，然而卻被日本總督府下令禁止，終至解散（雷寅雄，1988：1）。由此可見，日本殖民政府不容許被統治的人民有自發性的體育運動組織，更不容許他們向統治者的國家認同挑戰。

自 1945 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後，因國民政府在大陸上的挫敗和 1947 在台灣爆發全島性的二二八事變，造成國民黨對台灣社會與人民的高壓統治，也實行了全世界最長時間的戒嚴令，在戒嚴期間對於所有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思想、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等自由的箝制相當嚴厲。而在此時期體育運動成為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重要一環。早期的台灣省運動大會都是安排在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中上運動會則安排在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在這些特殊的節日舉行全台灣的運動大會，由國民黨的省主席主持開幕、唱國歌、總統訓詞、呼口號、唱愛國歌曲、大會舞、大會操……等都是展現黨國意識及權力象徵的符號和儀式。例如：第一屆台灣省運動大會田徑競賽，1946 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灣大學舉行，並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最高行政長官陳儀主持，蔣介石夫婦於當日親臨會場主持開幕儀式並致訓詞：

…… 你們現在回到祖國的懷抱，已成了中華民國的主人了，因此更要負起國家的責任，中正此次來到台灣，就是要將今後建設台灣的責任、

建設國家的責任，交付我們同胞！尤其是我們台灣的一般青年子弟，人人能夠認清自己的責任，共同一致，埋頭學習，鍛鍊強健的體格，恢復中華固有道德，就是要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雷寅雄，1988：9)。

雖然國民黨黨主席蔣介石親臨會場致詞具有宣示的意義，事實上在前一個月，國民黨的代表性刊物還強調台灣人民必須接受「再教育」，因為他們的「心智已被荼毒，而且被強迫接受扭曲的思想」(《新台灣月刊》，1946：1-3)。國民黨如同在大陸一般，似乎對中國問題主要癥結的闡述一半是儒家的道德說教，一半是哲學的陳腔濫調。來到台灣後仍然只看到人民的「民族精神」教育問題，並沒有看到或根本閉口不談導致政治、經濟與社會危機的真正問題所在(Barrington Moore, 1966: 198-99)。台灣社會仍充滿對國民黨新政府貪腐的不滿，台灣民眾積怨已深進而導致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的悲劇發生，在此事件中國民黨以武力掃除了大部分在未來的台灣民族運動中具有潛力的領導人物(羅伊，2004: 91-100)。從 1947 年的第二屆省運開始多了一項象徵意義的活動，並成爲省運會的一項傳統，就是聖火隊先從台南的延平郡王祠燃起火種，再由運動員列隊將聖火傳遞至全省各地(雷寅雄，1988：18)。透過此儀式強化鄭成功是漢人民族英雄的故事。

此後各單項運動協會和各地方政府每年舉行的「中正杯」比賽或新建的各種運動休閒建築場所都冠上「中正體育館」「中正體育運動公園」，國民黨統治階層之所以耗費鉅資，投注在各項體育運動活動、設施，無非是想藉由這些象徵和儀式，傳遞並強化黨國意識，並將其意識形態在潛移默化中注入民眾的運動休閒生活中，形成一種特定的認同感。國家介入運動休閒活動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 1952 年開始成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初期附屬於國防部之下，規定凡是高中、高職以上的學生、一律參加爲團員，各學校成立支部，軍訓教官爲救國團在學校內的直接負責人，並以中國國民黨之黨徽爲團旗圖樣。該團除靜態性活動外。動態性活動有(一)體育活動類(二)戰鬥訓練類(三)健行活動類(四)登山活動類(五)野營活動類。在這些運動休閒活動中，仍免不了要升旗、唱國歌、唱愛國歌

曲、讀訓、討論時事...等，思想教育的工作，中上學校之救國團，形同國民黨黨務工作的化身，甚至還可以給予中小學教師公假，參與救國團寒暑假活動(1980年省政府公報夏季號第七十期 13 頁)。救國團利用運動休閒活動吸引青少年，並以安排寒暑假休動活動，來灌輸黨化教育和國家認同的企圖一直都非常明顯。

國際的運動競技常常能喚起全國民眾的集體意識，例如：楊傳廣在 1960 年的羅馬奧林匹克運動會中榮獲十項全能的銀牌，當時國際奧會要求中華民國以「台灣」參加，否則只能棄權，最後總統蔣介石同意「忍辱負重」以「台灣」名義參賽。在棒球部分，1968 年紅葉少棒以 7：0 大敗日本，1969 年金龍少棒隊獲第廿三屆世界少年棒冠軍，1971 年巨人隊榮獲世界少棒賽冠軍...等，在 1970 年前後正是國民黨政權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節節敗退受挫的時刻，此時國際少棒比賽的勝利，執政者正好可以利用棒球運動來強化內部的集體意識，以彌補在國際政治上的挫敗。在 1984 年的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上舉行的棒球比賽，台灣的中華代表隊獲得第三名，當年 8 月 9 日中國時報的社論「棒壇起伏足深思」提及：

晚近以來，國運多艱，我們在國際間遭受了無限的委曲、不少的凌侮。行隔勢禁，難以抗衡。因此，一遇到國際性的比賽 ... 贏取勝利 ... 全體國人 ... 共享光榮的時刻，一洩胸間的塊壘。而給予我們這樣機會最多的，絕為棒球。棒球給我們帶來的自尊心、優越感，實在不可勝計。然而，今年的棒球並沒使我們滿足，甚至是挫折和失望。...我們所要追求的是絕對的勝利，勝利對我們太重要了，我們不能輸。(鄭欽仁，1989：332-33)

由這段話，可以看出運動文化不僅成了台灣社會文化的重心並產生和一種強烈民族主義結合的現象。統治階層對於體育運動常常都情有獨鍾，是因運動具有制度化和意識形態的特徵。國際運動賽會是國家取得政治合法性和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在代表隊的名稱和國歌和國旗上。自 1949 年國民黨來到台灣開始，與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競技場上的政治代表權問題及纏繞著國際奧會與國際運動組織。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認同爭鬥中，引起國際特別關注的是 1976 年的蒙特婁奧運會，加拿大政府要求台灣代表隊不得使用中國或中華

民國的名稱，但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主張堅持國旗、國歌和國號三者不可缺一。因此，加拿大拒發簽證給台灣代表隊。後來，國際奧會主席基蘭寧(Lord Killanin)於 1979 年尋求兩岸的代表名稱解決方式，邀請台灣、中國和國際奧委會一起開會討論，但台灣拒絕直接與中國對談。最後，他們得出結論中國奧委會的名稱為「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台灣奧委會的名稱為「Chinese Taipei Committee」(Hwang, 2003: 163-69)。雖然，當時台灣嚴正抗議但最後也不得不面對國際的現實情況，這也是後來所謂的「奧會模式」，而「Chinese Taipei」成了台灣在國際各種組織的「國號」。

2000 年的政黨輪替象徵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抬頭，但是運動對於國家認同的重要性並沒有減少。2004 年的雅典奧運會，台灣終於獲得奧運會的兩面跆拳道金牌，引起全台灣民眾的歡欣鼓舞，出現台灣早期才有的遊行接受民眾沿街祝賀「選手凱旋歸國」畫面。王建民於 2005 年四月登上美國職棒大聯盟，擔任紐約洋基隊先發投手，成為台灣第三位登上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棒球選手，也是繼曹錦輝之後第二位登上大聯盟的台灣籍投手。2005 年球季，紐約洋基隊晉級季後賽，同年十月六日王建民成為台灣第一位在美國職棒大聯盟季後賽出賽的投手。王建民在大聯盟的出賽，台灣公視幾乎全程轉播，無論是政府單位或民間團體都熱情支持。更被視為是台灣之光。如同前立委羅文嘉是紅襪隊的忠實球迷，在美國比賽現場觀賽時，他也忍不住將「球隊的認同」轉為「國家的認同」：

當介紹到最後一個洋基球員，也就是今天的投手王建民時，我終於忍不住站起來，大聲喊：「王建民，加油！」，並且用力鼓掌，這時所有人看著我，因為在一片靜默中，只有我一個人這麼做，我坐下，心裡很高興，因為，我從台灣來！

([http://www.wretch.cc/blog/wenjia&article\\_id=3535301](http://www.wretch.cc/blog/wenjia&article_id=3535301))

從台灣的歷史發展脈絡，可以觀察到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的重要關係。一般從運動社會學的觀點而言，較容易同意「所有的國家認同都是建構的」，真正的問題是國家認同是如何、從何處、由誰、以及為什麼而建構？在運動文化中的國

家認同的建構材料是來自於運動歷史、地理、生物、生產與再生產的制度、集體記憶、個人幻想、權力機器和宗教的啓示等。M. Castells (1997: 7) 強調認同的社會建構往往發生在權力關係的脈絡中，若按照他的概念區分，運動文化也可依國家認同的形式與起源區分為以下三種形式：

首先是正當性的國家認同 (*legitimizing national identity*)：由運動組織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他們對運動組織中行動者的支配。「合理化其結構性支配來源」的國家認同，也是市民社會與國家權力機器的關連。這關連環繞著同一相似的國家認同而組職起來。如日治時期，日本人控制大部分的運動的組織，以傳遞其統治正當性的認同。國民黨以及後來的民進黨政府亦然，只是無論何種政黨執政，台灣在國際運動組織上的正當性，仍受到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政治信條所影響。

其次是抵抗性的國家認同 (*resistance national identity*)：由支配邏輯下處於被貶抑或污名化的位置或處境的行動者所產生。這可能是運動社會中最重要的一種國家認同建構。以此認同抗拒無法忍受的壓迫方式，通常是建構在運動歷史、地理或生物面向等，能夠清楚界定範圍並使抗拒本質化的國家認同基礎上。如同 Scheff (1994: 281)所強調的「以族群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常因異化感和政治、經濟或社會不平等待遇而產生的憎惡感」。被排除的和排除性的國家認同之間交互傳播的可能性成為討論的議題。例如在國際運動賽會上、各項運動組織上或國際運動學術會議上對台灣的壓制，並強迫以「Chinese Taipei」或「中國台北」替代「中華民國」或「台灣」的情況，造成台灣人民對「中國認同」的反感。

最後是計畫性的國家認同 (*project national identity*)：運動社會的行動者基於他們能夠獲得的運動文化材料，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認同藉以重新界定他們的運動社會位置，並藉此尋求運動社會結構的全面改造。簡而言之，就是運動文化的「主體性」，然而主體並非個體，即使主體是由個體所產生並存在於個體當中。個別個體要經由「主體」這種集體的社會行動者來獲取他們經驗中的完整意義。近

十年來，有關台灣的體育運動史與本土化的傳統身體活動越來越受到重視，可以看出一種計畫性的國家認同逐漸浮現。

從以上的三種認同顯示台灣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的多重性與國際性，正如同台灣的歷史發展，自遠古以來台灣即是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南島語系文化的重要源頭。特別是十七世紀以來西方和亞洲列強的覬覦台灣，更顯得台灣從原始部落時代進入海洋時代，再進入現代化歷程的複雜性和人為建構下國家認同的多元性。然而從早期的身體活動到現代的運動文化，它們始終沒有在台灣的歷史上缺席。

## 伍、結論

從運動文化和國家認同的起源來看，它們都是屬於現代性的事物。特別是 Elias 強調運動化 (sportization) 和工業化 (industrialization) 同樣是人類現代史上重要的現象。要是沒有仔細研究它們的現代性，就不容易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從它們的現代性來觀察，運動文化的許多儀式與國家認同的符號幾乎都是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建構的。愛爾蘭的 GAA 運動組織，曾經在對抗英國的運動文化時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全球化的威脅下，GAA 也面臨威脅，台灣在強調本土體育運動文化時也有可能面臨類似的情況。蘇格蘭對足球的過於重視，反而導致在政治性國家認同的反作用，正如同台灣的棒球一般，似乎台灣民眾給予棒球過多的期待與使命感，反而可能影響人民政治上的自信心。加拿大開始嚴肅面對美國運動文化的影響，正如同台灣也正在面臨難以抗拒美國 NBA 籃球、大聯盟棒球、棒球經典賽以及世界杯足球的吸引一般，球迷對全球運動商業化的認同可能影響他們對國家的認同。

從現代運動的興起開始，特別是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對國家的熱情和榮耀化為競技比賽的重心，並與政治人物、王公貴族以及資產階級的配合下，使得運動比賽具有符號、標誌和儀式慣例在正式的典禮中展現，有如宗教的慶典一般。在



運動賽會期間，國家認同最強而有力的符號莫過於頒獎儀式。優勝國家的運動員站立在頒獎台上的最頂端，高於最接近的競爭對手之上，國家的色彩四處可見。金牌放置於優勝者的頸項上，國家旗幟升起，當國歌演奏時，優勝者轉向面對國旗。然後向鼓掌大聲叫喊的人群揮動著國家標誌，這是國家強而有力的必勝心態展現。

換言之，奧林匹克運動會促使運動成為「國家的利益」，在此情況下運動可以用來當成政治工具，可以成為國家的抵制手段、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取得國家認同、追求國家獨立或統一、以及追求種族在政治上的平等……等等。最後必須再強調的是運動文化涵蓋正當性、抗拒性和計畫性的國家認同，其複雜性的產生最大的因素之一是因為它是人為所建構。而在此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建構者或是認同者在社會、物質、精神、文化、性別和種族的位置也是不容忽視的。

## 參考文獻

- 《新台灣月刊》。1946。9月號，頁1-3。
- 《省政府公報》。1980。夏季號，70期，頁13。
- 甘爲霖 (Rev. William Campbell) 著，李雄揮譯。2003。《荷據下的福爾摩莎》。台北。前衛。
- 若林丈二、吳密察。2004。《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的交錯》頁271-312。台北。播種者。
- 周婉窈。1998。《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台北：聯經。
- 施正鋒。2000。《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
- 許佩賢。2005。《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
- 埃利亞斯 (Elias, Norbert) 著，王佩莉譯。1998。《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I》。北京：三聯書店。
- 湯錦台。2002。《大航海時代的台灣》。台北：貓頭鷹。
- 陳柔縉。2005。《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
- 程佳惠。2004。《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台北：遠流。
- 楊蓮福。2001。《圖說台灣歷史》。台北：博揚文化。
- 費正清 (Fairbank, John King) 著，張沛譯。《中國：傳統與變遷》。北京：世界知識。
- 鄭欽仁。1989。《生死存亡年代的臺灣》。台北：稻香出版社。
- 雷寅雄。1988。《台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 蔡禎雄。1995。《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
- 謝仕淵、謝佳芬。2003。《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果實。
- 謝仕淵。2004。〈殖民統治與身體政治：以日治初期台灣公學校體操科為例〉。
- 戴蒙 (Diamond, Jared) 著，王道還、廖月娟譯。1998。《槍砲、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台北：時報出版。
- 盧建榮。2006。〈歷史知識製作與國族認同〉演講。桃園：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專題演講。2006年6月2日下午4:00-6:00。
- 羅伊 (Roy, Denny)，何振盛、杜嘉芬譯。2004。《台灣政治史》。台北：商務。
- 鶴見 (Tsurumi, E. Patricia)，林正芳譯。1999。《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宜蘭市：仰山文教基金會。

### 英文參考文獻

- Allison, L. 2000.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J. Coakley and E. Dunning, eds. *Handbook of Sport Studies*, p. 354. London: Sage.
- Anderson, B. 1991. *Imag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airner, A. 2001. *Sport,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Barrington Moore,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Caldwell, G. 1982. "International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34, No. 2, pp. 173-83.
- Cameron, K. 1999. *National Identity*. Exeter: Intellect Books.
- Canovan, M. 1996. *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London: Blackwell.
- Elias, N. 1998. *On Civiliz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rsyth, R. 1992. "Sport," in M. Linklater, and R. Denniston, eds. *Anatomy of Scotland*, pp. 334-53. Edinburgh: Chambers.
- Gorn, E. J., and W. Goldstein. 1993.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Sport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Hall, A., T. Slack, and D. Whitson. 1991. *Sport in Canadian Society*.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 Hargreaves, J. 1992. "Olympism and Nationalism: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Vol. 27, No. 2, pp. 119-34.
-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Hobsbawm, E. J., and T. Ranger.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Holt, R. 1994. "The King over the Border: Denis Law and Scottish Football," G. Jarvie, and Walker, eds. *Scottish Sport in the making of Nation: Ninety Minute Patriots?* pp. 58-74.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 Houlihan, B. 1994. *Spor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mel Hempsted, UK: Harvester Wheatsheaf.
- Hwang, D. J. 2003. *Sport, Imper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port in China 1860-1993*.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K.
- Jarvie, G. 1991. *Highland Games: The Making of the Myt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 Jarvie, G., and G. Walker. 1994. "Ninety Minute Patriots? Scottish Sport i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 in G. Jarvie, and G. Walker, eds. *Scottish Sport i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 pp. 1-8.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 Lawton, W. 1995. Worn Themes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Quebec and Canadian Politics. *Politics*, Vol. 15, No. 3, pp. 167-74.

- Lynch, M. 1992. *Scotland: A New History*. London: Pimlico.
- Maguire, J. 1999. *Global Sport: Identity, Societ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Polity.
- Maguire, J., G. Jarvie, L. Mansfield, and J. Bradley. 2002.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 Mandle, W. F. 1987. *The Galic Athletic Association and Irish Nationalist Politics 1884-1924*. London: Gill and Macmillan.
- Mangan, J. A. 1987. *Sport in Africa: Essays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Mrozek, D. J. 1983. *Sport and the American Mentality, 1880-1910*.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 Paterson, L. 1994. *The Autonomy of Modern Scotlan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 Pope, S. W. 1997. *Patriotic Games: Sporting Traditions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1976-192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Rader, B. 1988. "The Quest for Subcommunities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Sport," in P. J. Zingg, ed. *The Sporting Image: Readings in American Sport History*, pp. 139-54.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Reijai, M., and C. H. Enloe. 1972. "Nation-State and State-N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pp. 140.
- Scheff, T. 1994. "Emotions and Identity: A Theory of Ethnic Nationalism," in C.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277-303.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Smith, A., and D. Porter. 2004.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Stoddart, B. 1982. "Sport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Some Explanatory Thoughts." *Proceedings of the 7th Commonwealth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rt, PE, Recreation and Dance*, 9.
- Stoddart, B. 1988. "Sport,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 Respon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0, No. 4, pp. 649-73.
- Wilcox, R. C. 1994. *Sport in the Global Village*. Morgantown: WV: Fit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Williams, R. 1983. *Key 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